

# 美国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

刁大明◎

**【内容提要】**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议题自2012年年初被提出以来，引发了美国战略界和学界的多方位观察与讨论，但其更多的是提出疑问和不同见解，凸显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与艰巨性。美国虽然能够正视中美在现实中的利益交织、合作空间与国际环境需要，认同两国努力谋求某种新型关系，即“不冲突、不对抗”以及“合作共赢”的必要性，并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实现一系列艰巨任务的途径，但也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本身持有疑虑，并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存在核心利益认同、战略布局挑战以及第三方因素干扰等多重障碍，即美方在两国“互相尊重”的实施与兑现上与中方存在明显分歧。本文将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与基本概念、现实基础、主要障碍以及实现路径四个方面尝试梳理、总结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关切、忧虑与建议，为理解美国政府的相关立场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核心利益 亚太战略

**【作者简介】** 刁大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电子邮箱：diaodm@cass.org.cn。

20 12年2月15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首次提出“新型大国关系”（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概

《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总第41期），第78—99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念，明确了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持续发展的方向：“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应该认真落实去年 1 月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就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两国利益汇合点和互利合作面，推动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努力把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塑造成 21 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sup>①</sup>

在“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提出至今将近三年的时间中，美国政府官员的回应出现了明显反复，也引发了美国学界众多的讨论与解读。相对而言，美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尽管低于中国，但仍对新型大国关系进行了多方位的观察与思考，更多地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疑问与不同见解。总体而言，美国学界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大致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即必要性与基本概念、现实基础、主要障碍以及实现路径。本文旨在对这些观点加以梳理与阐释，尝试总结美国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切、忧虑与建议，以期有助于解读奥巴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复立场。

## 一 美国官方立场的反复

2013 年 3 月 11 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隆 (Thomas Donilon) 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阐释美国亚太政策时，公开提及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他指出：“两国关系可能有更好的状态。但这需要美国和中国双方构建在既有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 (new model of relations between an existing power and an emerging one)。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都支持这一目标。……为了构建新型关系，我们必须持续完善沟通渠道，并在关乎双方的议题上践行合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与中国之间更为深入的两军对话是我们应对众多

---

<sup>①</sup> 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人民网，2012 年 2 月 17 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17137277.html>。

不安全根源和潜在冲突的关键。这也是我们努力实现的新型关系的必要内容，也是我们目前关系的一个严重欠缺。”<sup>①</sup> 这次表态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重要标志。<sup>②</sup> 但是，多尼隆讲话的重点放在了通过构建新型关系强化中美的沟通与合作，特别是强化两军关系上。

同年 4 月 23 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登普西 (Martin Dempsey) 首次访华，在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时表示：“此次访问是落实两国元首达成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军领导人进行了开诚布公的对话和坦诚深入的沟通，会谈富有成效。……美方愿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强互信，克服障碍，按照两国元首指引的方向努力深化两国两军关系。”<sup>③</sup> 此访显然是多尼隆讲话中提及的强化两军关系的一次具体落实，但登普西并未论及新型大国关系。

同年 6 月 7—8 日，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庄园会晤时，再次重申了新型大国关系，并将其概括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时隔 5 个月 after，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 (Susan Rice) 在乔治敦大学的公开演讲中再次回应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对中国而言，我们旨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这就意味着，在亚洲以及其他地区，两国要管控不可避免的竞争，同时在利益交织的议题上深入合作。我们共同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阿富汗局势的稳定与安全以及苏丹冲突的停止。我们有机会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推进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区的和平与发展，这些地方的稳步发展将为非洲人民和我们两个国家

---

① “Remarks By Tom Donil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March 1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② 达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7 期，第 60 页。

③ 《习近平会见美军参联会主席登普西》，人民网，2013 年 4 月 23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423/c70731-21250801.html>。

带来持久的收益。”<sup>①</sup> 这是美国现任联邦政府高层外事官员在公开场合首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完整使用“新型大国关系”一词，但其所阐释的意涵仍旧是避免冲突与强化合作，并未涉及“互相尊重核心利益”等关键内容。

2014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访问美国，与登普西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记者招待会。在记者会上，房峰辉谈及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中美两军的新型关系（new model of China-U. S. military relationship）。登普西虽然宣称“基于两军关系的对话加强了相互的了解与合作，并有助于管控分歧、避免误判与冲突”，但并未回应房峰辉关于中美两国和两军新型关系的提法。双方在随后的记者提问环节还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东海及南海事务各自申明了不同的立场。<sup>②</sup> 由此可见，美国军方更为关注不断增加中美两军的交流甚至合作，而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显得并不积极。

同年7月8日，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奥巴马在声明中再次以强调“合作”的论调回应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我们致力于持续与中国发展‘新型’（new model）关系，即增加合作实践与建设性地管控分歧。我们应该通过战略与经济对话来向世界证明，即便是双边关系如此复杂，我们仍有决心以合作来定义我们全部的关系。”<sup>③</sup>

但4个月后的11月4日，即在奥巴马访华前夕，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关于中美关系的专题演讲

---

①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E. Rice,” November 22,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1/21/remarks-prepared-delivery-national-security-advisor-susan-e-rice>.

② “Joint Chiefs of Staff Chairman General Martin E. Dempsey and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f China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 General Fang Fenghui,” May 15, 2014, <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5432>.

③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to the U. S. -China 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July 8,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7/08/statement-president-us-china-strategic-and-economic-dialogue>.

时，却刻意回避了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演讲通篇未提及“新型”(new model)一词。<sup>①</sup> 11月7日，在国务院举行的奥巴马亚太之行的吹风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管麦艾文(Evan Medeiros)回答相关提问时强调：“总统此前提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我们认为和希望构建一种可以避免中美两国之间战略对抗的关系。换言之，崛起大国和既有大国之间注定的重大权力冲突不是不可以避免的。这就是‘新型’理念的核心概念……但问题在于，如何构建这种关系？我们的观点是，也就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在扩展合作领域的同时，要小心翼翼地管控我们在竞争领域的分歧。……美国不参与‘口号外交’(slogan diplomacy)。……如果‘新型’意味着更多更好的合作以及防止必然的战略对抗的话，我们认为中美新型关系(new model of U. S. -China relations)是有意义的。……但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用不用这个说法’，而是‘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其内容是什么’。”<sup>②</sup> 麦艾文的表态不但阐述了奥巴马政府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态度，也再次暴露出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概念上的分歧，即美国认同构建中美“不冲突、不对抗”乃至“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但绝口不提“互相尊重”的“大国”关系。

在随后11月10—12日访华期间，奥巴马果然未在任何公开演讲和声明中重申新型大国关系。在12日两国元首共同出席的联合记者会上，习近平至少三次谈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奥巴马却连以往美国官员使用的“新型”一词也未提及。<sup>③</sup>

12月18日，奥巴马正式签署S. 1683号《军舰移转法案》，批准以出

---

① “Remarks on US-China Relations,” November 4, 2014,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11/233705.htm>.

② Briefing on Obama Trip to East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November 7, 2014,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4/11/20141108310720.html?CP.rss=true#axzz3K1P8jbnN>.

③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 November 12, 2014,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11/12/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esident-xi-jinping-joint-press-conference>.

售的方式向台湾地区转让四艘“佩里”级导弹护卫舰，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对台“租借”“诺克斯”级护卫舰以来首次向台湾地区提供军舰，提升了对台军售的水平。<sup>①</sup> 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于12月19日就美国对台军售表示坚决反对，重申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sup>②</sup> 24日，美国务卿克里发表书面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等人，<sup>③</sup> 公开“干涉别国内政，充当别国法官，侵犯别国的司法主权与独立”。<sup>④</sup> 美方这两个举动公然破坏了双方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特别是与其中“相互尊重”的要求背道而驰。

近三年来，美国政府官员的相关表态如此反复，可谓是奥巴马政府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上的徘徊甚至倒退，引发了各方对中美关系前景的众多猜测与忧虑。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了美国学界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之中。

## 二 关于必要性的共识

习近平在2014年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中，曾这样阐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性：“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双方更应该登高望远，加强合

---

① Aries Poon, “U. S. Approves Sale of Ships to Taiwa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9, 2014, [http://www.wsj.com/articles/u-s-approves-sale-of-ships-to-taiwan-1418982567?mod=fox\\_australian](http://www.wsj.com/articles/u-s-approves-sale-of-ships-to-taiwan-1418982567?mod=fox_australian); 以及美国国会官方网站相关网页: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3th-congress/senate-bill/1683?q=%7B%22search%22%3A%5B%22taiwan%22%5D%7D>。

② 《国防部：坚决反对美对台军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12月20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1220/c87228-26243765.html>。

③ “Kerry on 5th Anniversary of Liu Xiaobo’s Conviction,” December 24, 2014, <http://translations.state.gov/st/english/texttrans/2014/12/20141224312555.html#axzz3NCrCgGLG>。

④ 《外交部就克里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等答问》，中国网，2014年12月25日，[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12/25/content\\_34410601.htm](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12/25/content_34410601.htm)。

作, 坚持合作, 避免对抗, 既造福两国, 又兼济天下。”<sup>①</sup> 总体而言, 美国学界, 特别是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学者们普遍认同中美构建某种新型关系的必要性, 并将习近平提到的“灾难”理解为“修昔底德陷阱”及其引发的战争。

在美国学者看来, 这种必要性源自中美两国实力的对比变化。按照格雷厄姆·阿里森 (Graham T. Allison) 的说法, “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所有实力的国际排名中上升幅度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也就是一代人的时间, 这个国家的 GDP 从不到西班牙的水平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sup>②</sup> 而在“中国的发展态势被预期得以延续的同时, 美国却正处于长时期的持续衰落当中”, 这就将中美放置在了可能出现权力转移的更为平等的位置上。<sup>③</sup> “过去 1500 年来, 在 15 次崛起国家取代守成国家的权力转移中, 有 11 次是通过战争实现的。”<sup>④</sup> 面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美都有必要尝试努力解决这个历史困境, 避免两国关系陷入零和博弈。

美国学界密切关注到了中国的崛起, 甚至以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会和平崛起, 这“并非基于中国的文化因素或者国内政治因素等, 而是基于我们现行的国际政治体系”,<sup>⑤</sup> 中美之间势必会陷入紧张的安全竞争状态, 存在爆发战争的风险。但是, 在约瑟夫·奈 (Joseph Nye, Jr.)、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以

---

① 习近平:《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上的致辞》, 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4 年 7 月 9 日, [http://www.gov.cn/xinwen/2014-07/09/content\\_2714581.htm](http://www.gov.cn/xinwen/2014-07/09/content_2714581.htm)。

②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1, 2012, <http://www.ft.com/intl/cms/s/0/5d695b5a-ead3-11e1-984b-00144feab49a.html#axzz3933vVpea>。

③ Patrick M. Cronin, “The Path to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PacNet*, No. 80, November 7, 2013, <http://esis.org/publication/pacnet-80-path-new-type-great-power-relations>。

④ 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⑤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修订版), 王义桅、唐小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第 436—440 页。

及卜睿哲 (Richard Bush) 等人眼中, 中国的发展尚且需要漫长的时间。奈指出, 中国虽然经济总量迅速增长, 但仍旧受制于人口众多、地区差异较大等因素, 并不能迅速与美国构成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英之间的那种竞争关系, 因而也就不会对美国形成所谓的“米尔斯海默式的竞争”。“中国要实现与美国等同的权力资源, 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要面对很多发展中的挑战。”同时, 奈也承认, 虽然中国不太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展开竞争, 但有可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竞争者, 从而引发该区域内的对抗与冲突。在这种中国实力逐渐接近美国、两国在亚太区域的摩擦可能上升的漫长时间里, 中美需要构建某种新型大国关系。按照奈的说法, 美国需要接受中国作为崛起大国, 并邀请中国在国际机制中扮演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共同应对全球事务。“权力并不总是零和博弈。比如在中美两国都要面对的全球议题上, 两国的合作要比因紧张恐惧而分开行事具有更大获益。”<sup>①</sup> 与奈的观点相类似, 沈大伟延续了其新书中“不完全大国”(partial power) 的提法, 认为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 中美两国更为可行的现实考虑是管控竞争, 即保持所谓的“竞争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sup>②</sup> 卜睿哲则更多关注了中国方面的动机: “中国从二战以来美国创建的国际体系中获益良多, 即便中国并不喜欢其中一些规则以及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这就意味着, 中国并不会彻底挑战国际体系。而迅速崛起的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法与美国抗衡, 因而会以史为鉴, 避免重蹈国际关系史上旧有模式的覆辙, 为自身创造充分的发展空间。这对中国而言是好事, 美国也欢迎这种期待。<sup>③</sup>

<sup>①</sup> Joseph Nye, “A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US Focus*, February 26, 2013,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a-new-great-power-relationship>.

<sup>②</sup> David Shambaugh, “Prospects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US Focus*, March 7, 2013,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prospects-for-a-new-type-of-major-power-relationship/>.

<sup>③</sup> Richard Bush, “US-China New Pattern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PacNet*, No. 40A, June 12, 2013,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340A.pdf>.

### 三 关于基本概念的疑虑

虽然美国学界对中美两国应努力超越历史困境存在高度共识,但对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不是中美关系的必由之路则存在不同见解,这主要源自美国学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所持有的诸多疑虑。按照沈大伟的说法,这个概念更像是空洞的“华丽口号”(flowery slogan)。<sup>①</sup>

质疑之一就是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新”在何处,以戴维·莱(David Lai)、赵穗生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从这一概念中难以看到新意所在,主要有三方面理由:其一,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就是强调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核心利益、保持战略意图协调的基础上和平共处,这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存在重复。<sup>②</sup>其二,中国不接受 G2,却试图以新型大国关系这种“特殊安排”来减少冲突与对抗,但这个概念与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提出的所谓“战略再保障”似乎没有区别,即美国欢迎中国崛起,中国则必须向世界各国保证自身的发展与影响力提升不会带来安全隐患。<sup>③</sup>其三,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权力转移,例如 20 世纪初的美国取代英国,当时美英之间的大国关系相比于当今的中美关系似乎更为紧密。<sup>④</sup>

质疑之二集中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大国”标准上。赵穗生、布拉

---

① David Shambaugh, “Prospects fo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 .

② David Lai, “Doubts on China’s ‘New Model for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October 3, 2013,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index.cfm/articles/Doubts-On-Chinas-New-Model/2013/10/3>.

③ Suisheng Zhao,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nd China-US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Analysis*, No. 211, November 2013, [http://www.ispionline.i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zioni/analysis\\_211\\_2013.pdf](http://www.ispionline.it/sites/default/files/publicazioni/analysis_211_2013.pdf).

④ Suisheng Zhao,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nd China-US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

德·格洛瑟曼 (Brad Glosserman) 等人认为, 其中“大国”的概念过于模糊, 在新型大国关系的表述中, 中国显然将美国视为“大国”, 但当中国与其他国家推进新型大国关系时, “大国”的概念似乎就超出了传统现实主义对国家实力的界定。<sup>①</sup> “中国是否会将其与俄罗斯、印度、日本、巴西以及南非等国的关系也定义为‘新型大国关系’? 但这些关系显然无法与中美关系的水平等量齐观。”<sup>②</sup> 同时, “大国”也正在使中国的外交战略陷入“矛盾”之中。一方面, 中国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将自身定义为“大国”, 这与其以往所坚持的“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存在一定距离, 从而也就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 新型大国关系除了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和平共处”存在重叠外, 还与“平等互利”存在矛盾, 作为“大国”的中国有必要向那些“非大国”做出进一步解释。<sup>③</sup>

按照认同新型关系必要性的奈和卜睿哲的观点, 由于中美两国此前都无经验可循, 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又太过晦涩, 两国必须尽快将“口号式”的概念具体化与机制化, 赋予更多内容阐释, 这样才能使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 四 关于构建基础的初步共识

美国学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基础的讨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即合作基础与共处基础。合作基础是指中美关系本身的利益交织及其合作空间, 共处基础则是指塑造中美两国共处的国际环境。美国学界在这两个方向的构建基础上持有一定的初步共识。

---

① Brad Glosserman,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Hardly,” *PacNet*, No. 40, June 10, 2013, <http://csis.org/publication/pacnet-40-new-type-great-power-relations-hardly>.

② Suisheng Zhao,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nd China-US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③ Brad Glosserman,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Hardly”.

## (一) 合作基础

关于中美两国的利益交织,美国学界的观察以斯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的三方面总结最具代表性。其一,中美两国日益在经济、金融、贸易领域相互关联、相互依赖。过去 30 年来,中美经贸关系稳步深入发展,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特别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将更多融入国际经济与金融体系,并势必成为自由贸易、开放投资、市场导向货币的支持者。这种发展将增加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并为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提供长期的稳定性。其二,两国同为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峰会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在这些国际机制下,两国应该有解决外交、经济、贸易争端等问题的途径,而不需要诉诸武力。其三,随着中国不断成长为全球性大国(global power),中美两国事实上存在众多利益交汇点。这些交汇点可能成为双方分歧与争议的源头,也可以作为合作的基础。例如,中国一度将知识产权保护视为发达国家强加给中国的压力,但如果中国要发展为“创新国家”的话,就势必要保护知识产权。<sup>①</sup>

关于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在国际秩序持续变革的今天,众多议题和挑战并不是仅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而必须强化中美合作来共同应对,这也构成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基础。按照杰弗里·贝德(Jeffrey Bader)的看法,中美至少可以在四个方面展开积极合作并避免可能的冲突,即双边经贸关系、国际与全球事务、亚太地区安全,第三国冲突、乱局等“热点”事务,其中他强调了在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的中美合作。<sup>②</sup>相对于贝德提出的政治、经济与安全议题,斯蒂芬·哈德利

---

<sup>①</sup> Stephen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Atlantic Council*, October 11, 2013, <http://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us-china-a-new-model-of-great-power-relations>.

<sup>②</sup> Jeffrey Bader,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Insight*, June 2013, [http://www.amcham-shanghai.org/amchamportal/InfoVault\\_Library/2013/Insight-A-New-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hip.pdf](http://www.amcham-shanghai.org/amchamportal/InfoVault_Library/2013/Insight-A-New-Type-of-Great-Power-Relationship.pdf).

则关注于全球治理意义上的合作，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合作，即提振持续低迷的经济，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应对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极端天气变化，保证能源、食物以及水资源的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海盗以及跨国犯罪。<sup>①</sup> 邓马克（Abraham M. Denmark）则更为聚焦地讨论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全球公共领域内合作的巨大空间。他认为，中美在海洋领域虽然存在分歧，但两国在深海开放、自由航行、全球贸易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在太空领域，中国的确对美国构成一定挑战，但两国在国际条约、太空技术、太空安全以及太空开发等方面仍有合作的需求；而在网络方面，由于不存在国际条约的约束，两国在网络安全上的冲突日渐升级，但维护网络安全仍旧是两国需要共同合作解决的重大挑战。<sup>②</sup>

## （二）共处基础

就作为中美共处基础的国际环境而言，两国之间并不存在导致大国冲突的传统因素，亚太地区也不存在所谓的“遏制战略”。其一，自19世纪以来，中美两国均不是扩张性国家，两国并不存在领土争端、势力范围冲突等传统冲突点。其二，两国均不存在挑战对方的战略意图。美国并没有试图排斥、孤立或控制中国的发展；而中国目前显然也不企图超越美国，而只是希望维持一个有助于其内部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sup>③</sup> 其三，随着美国重返亚太，中国战略界越来越多地认为美国在联合盟友遏制中国，而美国的“遏制政策”将是攻击性的，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其原因包括：如今中美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之高是冷战时期美苏关系无法比拟的；美国的亚太盟友不会在中美之间做出最终选择，因而美国也难以组成所谓的“反华联盟”；国际格局处于由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崛起而导致的从单极主导到多极化的临界点上，美国的竞争地位取决于其国

① Stephen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② Abraham M. Denmark, "Forg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Commo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No. 35, 2013, pp. 129 - 136.

③ Stephen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内政治和经济的健康发展,美国国内问题特别是财政问题将制约美国的亚太战略。<sup>①</sup>

## 五 关于构建障碍的普遍疑虑

美国学界普遍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较多障碍,其主要表现在对核心利益的界定、两国战略意图的设置以及复杂的第三方因素的介入等方面。

### (一) 核心利益的界定

关于核心利益界定的争论,主要源自中国对新型大国关系内容阐释中的“互相尊重”,即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关切。按照中方的说法,中国从不做有损美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事,但美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却难以令中方满意。<sup>②</sup>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内,双方都应该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关切,这也是双方建立互信的一个基础性前提。这就意味着,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中国保证不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作为回报,美国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sup>③</sup>对于美国而言,核心利益是中国近年来才频繁提出的概念,而中国强调对核心利益的维护就好像“把车放在了马前面”,并不是那么轻易能接受的要求。<sup>④</sup>

第一,何为中国的核心利益,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界定尚不明确。布拉德·格洛瑟曼推测,鉴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各种表达,中国的核心利益一般包括台湾问题、涉藏问题和新疆事务,同时仍然存在南海事务、钓鱼岛

---

① Suisheng Zhao,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nd China-US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② 崔天凯、庞含兆:《新时期中国外交全局中的中美关系》,《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第 1—8 页。

③ Suisheng Zhao,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nd China-US Competi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④ David Lai, “Doubts on China’s ‘New Model for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问题是否属于中国核心利益的争论。<sup>①</sup> 而戴维·莱则更为具体地将中国要求美国承认的核心利益总结为七个方面：国家的主权与独立自主、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保持中国宪法框架下的政治制度、社会总体稳定、经济与社会稳步发展的基本安全保障。<sup>②</sup>

第二，在中国核心利益的表述下，美国难以彻底接受甚至难以予以尊重。按照迈克尔·蔡斯（Michael S. Chase）的说法，在互相尊重的要求下，中国似乎要求美国更多地配合中国的利益，并不加以任何可能的修改。事实上，这种“尊重”更像是要求美国“顺从”中国在争议议题上的关切与想法。“虽然建立稳定健康的两国关系、加深互信是值得赞美的目标，但中国的要求为实现新型大国关系增加了难度。”<sup>③</sup>

第三，从互相尊重的角度出发，布拉德·格洛瑟曼等人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事实上就是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传统大国关系概念，即中国主张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在要求美国尊重其核心利益，特别是领土与安全方面利益的基础上，“中国在其势力范围，即亚洲区域可以说一不二。如果其他所谓‘大国’也如法炮制的话，那就和历史上的‘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如出一辙了”。<sup>④</sup>

第四，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有待互相磨合。按照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的观点，领土、边境及主权等中国的核心利益，与航行自由等美国的核心利益存在冲突的可能性。同时，中国抱怨美国对台军售、会见达赖，美国则指责中国反对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中国的网络攻击以及反卫星行为。因此，两国能否在核心利益问题上达成新的互相理解，将是对两国关系极为关键的挑战。<sup>⑤</sup>

① Brad Glosserman,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Hardly".

② David Lai, "Doubts on China's 'New Model for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③ Michael S. Chase, "China's Search for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 Brief*, Vol. XII, Issue 17, September 7, 2012, pp. 12 - 16.

④ Brad Glosserman,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Hardly".

⑤ Robert A. Manning, "US and China Explore New Relationship," *Yale Global*, June 11, 2013,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us-and-china-explore-new-relationship>.

## (二) 战略意图的设置

关于两国的战略意图设置因素,美国学界的讨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的差异,即两国对自身的定位、对国际责任的认知、基于历史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两国军事力量的互动。

首先,中美对自身定位方面的差异不但源自两国公众的认知,而且也存在于国家战略层面。按照哈德利的观点,在公众层次上,美国公众长期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主导者,未必愿意接受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较平等地位。更多的美国人需要明白,两国之间以及美国与其他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更为平等的合作,有助于解决全球问题,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中国公众则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沦为美国持续遏制中国的众多手段之一,使其能用“国际责任与义务”限制中国。正如哈德利所言,“中国公众要相信,美国与中国平等地在国际上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是完全符合中国利益的。这也是中国唯一的能够实现繁荣富强、为公众提供更好生活的途径”。<sup>①</sup>两国公众的认识差异,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增加了民族主义成本,对此政治家们需要做得更多。

在国家层次上,梅尔·古托夫(Mel Gurtov)认为,迅速崛起的中国期待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扮演主要甚至主导地位。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但会期待在国际体制内增加自身的影响力。中国希望改革国际体制,而非颠覆体制。中国在承认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的同时,却反对美国作为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具有特别主导地位国家的宣示,并将美国视为其崛起的主要障碍,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日趋复杂化。美国则自视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代表着普世价值,可以对任何国家的事务表达看法。当中国关注本国快速发展和国内秩序时,美国则关注保持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维持在世界上的军事投射。美国也在怀疑中国的国际野心,并要求中国军费和武器项目的透明化。<sup>②</sup>

<sup>①</sup> Stephen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

<sup>②</sup> Mel Gurtov,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11, Issue 52, No. 1, December 30, 2013, <http://www.japanfocus.org/-Mel-Gurtov/4052>.

其次，中美两国对国际责任存在不同解读。美国曾经给中国一个定位，即“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将中国视为国际事务中的伙伴。中国分析者认为，其本意是要求中国在关键的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全球金融秩序等国际事务中支持美国，至今美国还会使用这个词来迫使中国支持美国的立场。中国则倾向于将自己定位为“负责任的大国”，宣称自身的和平发展将打破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旧有模式。中国指责美国在中东及中亚地区的单边介入、在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的强硬政策以及处理全球金融事务的失败等，难以与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相称；美国则指责中国在钓鱼岛争端上的强硬姿态、反对针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等做法无法与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地位相称。在很多国际议题上，如全球变暖、能源等，两国都在“负责任”的概念上存在很大分歧。这些都直接阻碍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推进。<sup>①</sup>同时，除了国际责任之外，中美两国还存在很多沟通问题，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存在差异，包括“遏制”“霸权”“合作”以及“协商”等。比如，中国认为的主权概念包括海洋，这直接与美国的“航行自由”相冲突。中美在人权、新闻自由等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很大分歧。<sup>②</sup>

再次，基于历史的意识形态差异主要源自冷战时期的遗产。梅尔·古托夫指出，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显然是为了摒弃所谓“冷战思维”，但无论是网络战、台湾问题、海上军事冲突以及领土争端等方面，中美双方似乎都采取自我辩解、指责对方以及展示武力等冷战时代惯用的手法，而非协调或诉诸国际判决等途径。虽然中美之间已建立众多的交流机制，但两国仍旧存在着与冷战时代美苏之间相同的意识形态分歧。美国也不会相信多极化世界，而中国则仍旧存在“反帝反霸”的传统战略思维。<sup>③</sup>

最后，中美两军关系存在失衡的状态（military imbalance）。一方面，中国在各项军事指标上都明显落后于美国，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

① Mel Gurtov,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② Stephen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③ Mel Gurtov,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虽然有观点认为中国军力将逐年增长并逼近美国，但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美国不会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坐视不理，除非联邦财政能力有限；二是中国不会走苏联挑起军备竞赛、最终拖垮经济的老路。另一方面，中美在亚太地区仍旧存在发生军事冲突特别是海上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因此，中美两国必须强化军事交流、对话以及合作，强化危机管控机制，减少误判。美国需要接受中国经济发展、军事强大的事实，并接受中国海军力量持续增加的全球存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哈德利指出，中国海军力量的增强，如果可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话，也会减轻美国海军维护全球航道的负担。中国则需要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在该地区的盟友关系。美国的军事存在与盟友关系，也可以让忧虑中国的邻国更容易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sup>①</sup>

### (三) 第三方因素的介入

关于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既是中美合作的切入点，也是中美冲突与分歧的爆发现点。就此，美国学界更为关注中美在朝核问题以及东北亚局势上的互动。就朝核问题而言，克里斯托夫·约翰逊（Christopher K. Johnson）和葛来仪（Bonnie S. Glaser）认为，中美的底线始终存在差异，中国的底线是朝鲜不再挑起事端，美国的底线则是无核化。底线差异决定了中美分歧，尽管两国都致力于无核化，但采取的手段和关注点并不一致。中国致力于重启六方会谈，美国及其盟友则认为在重启会谈之前需要朝鲜兑现在此前的会谈中所做出的承诺、遵守联合国决议并放弃核武器。中美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深，特别是针对平壤方面的政策分歧不断，这种趋势将极为不利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sup>②</sup> 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中日关系方面，按照包道格（Douglas Paal）的说法，根据中国

<sup>①</sup> Stephen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sup>②</sup> Christopher K. Johnson and Bonnie S. Glaser, "A New Type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on North Korea," *Freeman Report*, Issue 13, September 2013, <http://csis.org/publication/thoughts-chairman-new-type-major-power-relations-north-korea>.

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美国在钓鱼岛争端上对日本的支持不仅是与中国的立场分歧，更是对中美互信的破坏。<sup>①</sup>

## 六 关于构建广泛途径的建议

概括而言，按照罗伯特·曼宁的说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求两国寻找利益的平衡点，因此双方都应该更为关注对方如何处理彼此的核心利益。<sup>②</sup> 具体来讲，戴维·兰普顿（David Lampton）、哈德利以及帕特里克·克罗宁（Patrick Cronin）等人提出的构建途径虽然广泛涵盖了中美关系的众多方面，但仍旧强调强化合作与避免冲突，并未就推进互相尊重核心利益直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甚至按照哈德利的说法，中美两国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即便是在新型关系框架之下，一方仍旧可能会做一些对方不喜欢甚至被认为可能有损对方利益的事情，如美国会继续指责中国的人权和民主。”<sup>③</sup> 美国学界关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途径的建议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美两国需要将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置于两国关系的核心位置。这对于两国实现和平、繁荣以及实现各自国家未来的目标极为关键。中美两国特别是在政治体制的顶端，应当完善合作与互利的战略认知，开展更多密切的沟通以及促进两军之间的合作，以此推进更为有效的危机管理、国内的外交政策以及安全协调。<sup>④</sup> 同时，中美两国需要建立在食品、能源、水资源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协调机制，以合作或同步发展取代竞争性开发。<sup>⑤</sup>

第二，中美两国需要提升各自的危机管控和分歧处理机制，以此防止

---

① “One Model, Two Interpretations,”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28,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china/21586849-relabelling-relations-between-china-and-america-has-not-resolved-underlying-tensions-one-model>.

② Robert A. Manning, “US and China Explore New Relationship” .

③ Stephen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

④ David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Seeking A Durable Foundation for U. S. -China Ties,” *Asia Policy*, No. 16, 2013, pp. 51 – 68.

⑤ Stephen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

冲突、避免影响两国在全球事务上的合作，并保护整体关系。比如，中美两国领导人需要建立第一时间的危机管控交流磋商机制，尽可能减少反应与被反应环节，不要被公众与媒体所驱动。又如，中美两国需要就海洋领域的危机管控机制进行有效磋商。领土争端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最好的方式是管控分歧，保证各方克制，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中美有足够多的机制可以有效管控分歧，确保南海争端处于控制之中。再如，中美双方官员应当进行战略对话，限制两国在网络空间、外太空等领域的战略竞争，特别是中美在军备和军费方面的可能竞争。<sup>①</sup>

第三，中美要扩展并深化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并实现真正的互利与对等。两国应当继续深化经济的相互依赖度，特别是在省（州）和地方层次有助于促进就业的产业合作。这将为扩大投资减少不必要的障碍，并增加现有投资的安全程度，如通过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来实现。<sup>②</sup>此外，在贸易领域，中美两国需要建立地区、多边安全与经济合作框架，这些框架应当涵盖两国，而不是将一国排除在外。<sup>③</sup>

第四，中美两国应当做好第三方的因素管理以及地区机制化合作。其一，中美两国都需要对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的国家施加一定的限制性影响。对那些不同意遵循符合两国关系利益的国家，需要被提醒履行更为广泛的义务。其二，中美双方需要共同遏制在朝核和伊朗核问题上的核扩散威胁。在朝核问题上，中美两国应当更为努力地重启六方会谈，如果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的话，中美双方应当做好动员自身力量和国际联盟以阻止朝鲜利用或出口核武器的可能性。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应当认识到伊朗的核扩散举动将导致周边海湾国家特别是不稳定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这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对海湾地区石油的依赖并不是一个好的地缘环境。<sup>④</sup>其三，中美联手建立东北亚地区机制符合两国利益。亚洲的冲突管理需要地

① Patrick M. Cronin, "The Path to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② David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③ David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④ Patrick M. Cronin, "The Path to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区机制与磋商。如果中美两国要进一步解决平壤问题，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框架就是很好的步骤。可以不用等待新一轮六方会谈，中美直接建立新的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讨论包括环境争议、领土争端等比朝鲜半岛无核化更容易解决的安全议题，以此增加各方足够的互信。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也更为容易在地区安全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sup>①</sup>

第五，中美需要共同努力建立更好的两军关系。中美两国需要在人道主义救援和危机管理方面增加军事合作，规范两军关系，一方应该明确另一方对待自身安全环境和对对方的看法。<sup>②</sup> 梅尔·格托夫指出，一方面，美国需要调整军事计划。目前，美国强化在亚太的军事投入无助于维持中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以及东盟的积极关系，并且毫无必要地把中国树为敌人，这并不符合上述国家的利益。这些军事政策事实上削弱了美国与中国在国际议题上合作、建立战略稳定的希望。另一方面，梅尔·格托夫认为，中国在钓鱼岛、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宣示增加了冲突的风险，也增加了美国对其盟友的军事承诺的空间。<sup>③</sup>

第六，中美两国政府要努力将两国社会编织在一起，令公众重视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意义，为这一努力提供国内基础。一方面，两国应当确定3—5个明显具有代表性的互惠合作项目，如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能源页岩气、空间等领域的合作，以此加深公众认同；<sup>④</sup> 两国都应重视各省（州）、各地方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交流。增加在地方层次的经济与其他双边关系的相互依赖。2012年习近平访问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正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另一方面，两国应当充分考虑对方国家特别是公众的感受，避免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因受到某种声音、组织或利益的驱动而激怒对方。<sup>⑤</sup>

① Mel Gurtov,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② David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③ Mel Gurtov, "The Uncertain Future of A 'New Type' of US-China Relationship".

④ Stephen Hadley, "US-China: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⑤ David Lampton, "A New Type of Major-Power Relationship".

## 七 美国的态度与长期的努力

客观地讲,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在于美国的态度,<sup>①</sup>而美国学界的激烈讨论也充分体现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参与讨论的美国学者虽然能够认同中美两国努力谋求某种“新型”关系的必要性,并承认现实中两国的利益交织、合作空间与国际环境的需要,但多数学者更多关注的是核心利益的界定、战略布局的障碍以及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等阻碍中美新型关系的现实问题。即便少数学者可以积极地提出某些建议,也仅仅是强调在众多领域内避免冲突和强化合作,这需要双方长期且全方位的努力才有实现的可能。换言之,如果将美方的态度放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层面上,“不冲突”与“不对抗”毫无存疑,“合作共赢”也有一定认同,但“互相尊重”则是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中之重,这也正是习近平在 2014 年 11 月 12 日与奥巴马会谈时为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提出六个具体化重点方向的原因所在。

从中美双方的构建实践看,中国始终在积极推进,而奥巴马政府则表现出前文提及的反复或倒退。美国政府此举的动机完全可以从其学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疑虑中得到解释。首先,如果接受新型大国关系、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美国似乎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已无力促进亚洲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不得不将责任与地区管辖权转交给中国。这显然不符合奥巴马两度竞选时做出的维护美国全球唯一领导地位的承诺,也难以被美国军方接受,同时也与美国目前推进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意图背道而驰。其次,接受新型大国关系,就可能意味着承认由中国崛起而导致的权力转移已势不可当,进而必须将中国视为“大国”。但依照美国学界和战略界的某些看法,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且社会矛盾也存在继续爆发的可

<sup>①</sup> 张小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国际政治研究》2014 年第 1 期,第 56 页。

能，因而对中国国力在未来的持续增长存有疑虑，并持有观望态度，这也使其未必愿意主动接受作为“大国”的中国。再次，接受新型大国关系将使得美国难以协调其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在第三方因素深刻影响中美关系的前提下，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甚至中国台湾等是美国推行其亚太战略的基础，奥巴马政府只能对此保持某种微妙的战略平衡。<sup>①</sup> 最后，奥巴马政府关于新型大国关系表态的反复，也凸显其决策层在对华政策和亚太事务上有一定分歧，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核心决策圈子对中国及亚太事务缺乏必要的了解与积累，另一方面也足见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双方都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循的新探究。

基于这些原因，奥巴马政府更为倾向于在“不冲突、不对抗”的基础上，不对中国当前在国际和亚太地区所占据的地位做出判断，只强调中美在利益交织领域进行合作、在分歧领域进行建设性管控的具体实践，并促使中国为国际体系承担更多责任、提供更多公共物品。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可能有二：其一是奥巴马政府对中方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不再回应，而另起炉灶地提出一个中美关系“新模式”（new model）的定位；其二是奥巴马政府在对中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解读不置可否的前提下，强调自身对该概念的阐释，借助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向中方提出在具体操作上的行动要求。

总体而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美两国关系势必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新型大国关系将可能是中美两国在众多全球与区域事务上尝试长期合作积累的成果，需要愚公移山的勇气与水滴石穿的耐心。同时，“中美两国必须警惕，不要因为固执己见、毫不妥协的大国思维而丧失合作的良机，陷入大国悲剧的自我实现当中。中美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但不要成为历史的奴隶”。<sup>②</sup>

---

① Andrew S. Erickson and Adam P. Liff, “Not-So-Empty Talk The Danger of China’s ‘New Type of Great-Power Relations’ Slogan,”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9, 2014,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2178/andrew-s-erickson-and-adam-p-liff/not-so-empty-talk>.

② Abraham M. Denmark, “Forging A New Type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Commons” .